

★民族研究★

夏尔巴人族源问题再探

王丽莺 杨 浣 马升林

【摘 要】夏尔巴人与西夏亡国后境内党项遗民的去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可能和隋唐以来世居四川甘孜地区的土著族群即弭药（木雅）有亲缘关系。西藏樟木夏尔巴人、四川丹巴嘉绒藏族、康定木雅人中流行的“西夏皇族后裔说”很可能是 1980 年代以来一些学术观点经由媒体传炒作和输入的结果。

【关键词】夏尔巴人；西夏；木雅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2)03-0024-03

“夏尔巴”是一支生活在我国西藏与尼泊尔、锡金交界地带的少数族裔。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名称来自藏文 sar—pa 一词的音译，意为“东方人”，英文写作“sharpa”或“sherpa”，旧译也作“舍尔巴”、“舍帕”或“谢尔巴”等。

根据夏尔巴人的口传历史和夏尔巴学者桑结甸增 1970 年发表的《夏尔巴喇嘛桑结甸增传》、《夏尔巴佛教史》和《夏尔巴先祖世系》等书的记载，夏尔巴人是以“康地塞莫岗（今金沙江和雅砻江中间地带，也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白玉、德格、邓柯、石渠等县境）木雅巴（人）为核心的若干支‘康巴（人）’”（今指今西藏昌都地区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1]）部族组成的迁徙集团的后裔。^[2]

对于夏尔巴人内部的这一说法，迄今为止学术界都未曾提出过质疑。事实上，所有关于夏尔巴人族源问题的讨论也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各种观点争锋的焦点不在于夏尔巴人是不是木雅康巴的后代，而在于木雅康巴到底属于哪一支民族。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看法综合起来大致有三类：第一类认为属于藏族。喇嘛身份的夏尔巴学者桑结甸增认为木雅巴是“西藏六人种”之一的“董族”的亲属“格尔王”的后代。^[2]黄颢据此认为塞莫岗的木雅巴当属藏族，他们“约在宋代又伙同其他民族后裔西迁定日，大概在元、明、其中一部南迁‘夏尔康布’或‘昆布’。由出自西藏许多氏族（或家族）的这些康巴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夏尔巴人。没有南迁昆布而定居定口的夏尔巴人是在同一个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些木雅康巴“且与住在其东部木雅热甫岗即今康定县折多山以西、乾宁以东地区的西夏后裔木雅人不同”。^[1]黄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藏语学界的支持。他们基于夏尔巴语与藏语的比较研究认为“夏尔巴话是藏语，即原来使用康方言的部分藏族南迁尼泊尔，后来又部分迁回西藏，在迁徙过程中和后来与使用卫藏方言的人比邻而居，长期受到卫藏方言的影响，换用方言的结果，只是保留了康方言和外来语的词汇底层。由于夏尔巴话处于‘语言飞地’和‘方言岛’的状态，发展和演变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卫藏方言其它土语的差别较大，因此它又是卫藏方言的一个独立的新土语。”^[3]

作者简介：王丽莺，宁夏大学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宁夏银川，邮编：750021）

杨 浣、马升林，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宁夏银川，邮编：750021）

第二类观点认为夏尔巴人是党项羌的一支。陈乃文先生指出，夏尔巴仅仅表示地理方位，弭药巴（即木雅巴）才标示族群之来源。根据汉、藏史籍众多记载勘同，弭药巴号称猕猴种，本出于西羌，与藏族同源，自唐代以来被看作是党项羌的一支。“他们于宋末陆续西迁后藏，后辗转越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进入今尼泊尔的索卢、昆布，形成今日的夏尔巴人。”^[4]

第三类观点认为夏尔巴人为西夏人的后裔。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切排等先生。他们猜想“12世纪西夏被蒙古灭亡后，一部分西夏人为了躲避战争，从西康往西迁徙到后藏和尼泊尔，后来逐渐与当地的绒巴（山地人）通婚，繁衍了后代，当地的异族把他们称为夏尔巴人”。“大量的夏尔巴人迁往藏尼边界的时间应该是13世纪末，而且不是一次性的迁徙，是在那一段动乱时期，陆续迁往的。原来由于战乱侵袭曾使一些夏尔巴人迁至藏尼边界，后来西夏被灭之后，那部分原来的木雅人，又沿着当年寻找牧场北上的路线返回木雅。公元1260年忽必烈南征时，木雅人再次遭战乱，于是这部分人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了前往藏尼的路程。”^[5]大约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实地考察过夏尔巴人地区的唐荣尧先生感性的写道：“（西夏党项人）从西北地区逃离大夏国的首都银川后，基本沿着后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逆方向，从西北到了西南，在今阿坝、甘孜一带生活了近100年的时间，强大的蒙古军队开拔到这里，和八思巴合谋建立藏地八思巴亲蒙政权后，一些党项人已经逐渐融入当地人中间了，但那些血骨里一直坚持党项人纯度的皇室成员，开始再一次逃亡，这次的方向是一条生命禁区内的死亡之旅，从南北两线，进入西藏，双方在昌都会合。这是昌都有大量mi nia的原因，也是党项人对这里推崇的原因。不久，越来越多的党项人和加入这一行列的其他民族的人，集聚昌都，形成了这里影响巨大的‘羌都’。元代政权招抚了藏族八思巴政权和德格土司后，这两种力量从西和东两方面夹击‘羌都’，党项人只好开始了青藏高原上的大迁徙，最后落脚米尼雅山腰，成了后来的夏尔巴……”^[6]

必须要指出，第三种即关于夏尔巴人是西夏人后裔这一观点并没有什么有力的材料或证据。不过这也不能说这个观点完全出自这些作者的凭空想像，这应该是西夏学界由来已久的“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南徙论”的进一步发挥与演绎。

1940年代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在甘孜等地区考察期间，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得知关于“西吴王”的故事。传说西吴王原是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叫“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西吴王政权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小政权，当地的木雅族群就是西吴王带来的西夏遗民的后裔。^[7]1980年代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先生通过对四川木雅地区的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的记载，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成的。他在调查中还发现，甘孜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西夏语十分接近，他们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8]

既然夏尔巴人说自己是由康地的木雅巴迁到尼泊尔、西藏边境的，而根据学者的研究又认为木雅巴很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党项遗民南徙的产物，所以有人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夏尔巴人是西夏党项人后裔的联想。但是史金波先生认为关于“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南徙木雅原地”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传说或推测之上，没有什么可靠的文献或文物作为证明。学界经常引用的来自《旧唐书·党项传》的那段史料即：

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其故地陷入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9]

只能表明木雅即弭药可能是唐代党项族北迁时留居原地的族群，而不能凭空演绎为木雅巴就是西夏灭亡以后回归故里的党项。

现代仍有木雅人，分布在甘孜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木雅乡。如果说他们和西夏有联系，则是指他们和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未迁入河西、陇右之前，是居住在一起的同一个民族。党项族主体北迁之后，留下的被称之为弭药的党项族，逐渐融入藏族后，语言、风俗均发生了很大变化。^[10]换句话说，夏尔巴人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党项羌的后代，但似乎不应该被视为西夏遗民的后裔。

我们认为西夏遗民及其现代西夏后裔的确定，至少需要下列任何一项必须的条件。一是有若

于文献资料如史籍、宗谱的印证;一是文物资料如碑铭、经幢的佐证。比如依靠汉文史籍记载确定的元代西夏人^[11];依靠藏文史籍记载确定的元明时期西藏北昂仁的西夏遗族^[12];依靠宗谱确定了安徽的元末党项人余阙的后代^[13];依靠碑铭和文集确定河南濮阳杨姓为元代西夏人唐兀台后裔^[14];依靠西夏文经幢确定明代河北保定有西夏后裔活动^[15]等。

此外,还有一项条件也必须正视,这就是族群内部对民族来源或属性的认同。我们调查发现,在西藏定结县陈塘镇夏尔巴人中,还没有发现自称党项或西夏后裔甚至弭药巴的现象;而在西藏聂拉木县樟木的夏尔巴人中以及四川丹巴嘉绒藏、康定木雅人中均有自称西夏皇族后裔的说法。不过追问这一说法的来历,他们自己要么说不清楚,要么仅仅表示听说而已,显见它是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果和媒体新闻传播的知识“倒灌”的结果。这是因为第一,无论是樟木夏尔巴,或者丹巴嘉绒藏,或者康定木雅人,迄今为止内部都无法说清楚自己和西夏人的关系。第二,学界提出的这些地区现有的文献和文物甚至风俗习惯上的材料都和西夏历史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关于他们是西夏人后裔的说法首先开始于学术界,在媒体炒作之前他们内部均无这样的说法。在环境较为封闭的陈塘夏尔巴人中,绝大多数关于本族群的来源说法是尼泊尔昆布,这暗示出夏尔巴人从尼泊尔回迁西藏定结县的事实。调查还显示,夏尔巴人内部对藏族的认同与其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高低成反比,文化水平越高的夏尔巴人越注意维系和保护本族群的固有文化。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夏尔巴人和西夏亡国后境内党项遗民的去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可能和隋唐以来世居四川甘孜地区的土著族群被称为弭药(木雅)的党项有亲缘关系。根据《夏尔巴佛教史》、《夏尔巴先祖世系》等文献的记载和学者的研究,夏尔巴人迁徙的大致路线为由于宋代格萨尔王的征伐战乱,木雅康巴人被迫离开康地寒莫岗,经过羌塘前往拉萨前藏地区,然后到达后藏定日地区,居住到明初以后,一部分越过中尼边境的囊巴雪山,至昆布定居。^[1]中国境内陈塘夏尔巴人是尼泊尔昆布地区夏尔巴人部分回迁西藏的结果。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系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批准号09YJA770032)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也是2011年7—8月间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夏尔巴人族源问题调查”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黄颢.夏尔巴人族源试探[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 [2]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辑的内部资料.夏尔巴人资料汇编[Z].1979年,p22—32
- [3] 瞿霭堂.夏尔巴语的识别——卫藏方言的又一个新土语[J].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A].谭克让.夏尔巴藏语的声调系统[J].民族语文,1987年第2期
- [4] 陈乃文.夏尔巴源流探索[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 [5] 切排、桑代吉.夏尔巴人的历史与现状调查[J].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 [6] 唐荣尧.夏尔巴人的猜想[J].中国西藏,2006年第6期
- [7]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C].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 [8] 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C].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 [9]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 [10] 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884
- [11] 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J].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 [12] 黄颢.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J].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 [13] 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J].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A].史金波、吴峰云.元代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J].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 [14] 何广博.述善集研究论集[C].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5]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J].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A].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J].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责任编辑:林俊华]